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智能计算路径

佟德志 林锦涛

当今世界正处于知识创新与数字技术迭代发展的交汇点上,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计算,不仅产生了越来越庞大的数据,也带来了算法、算力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了一场技术革命。另一方面,人类的知识体系也在发生从量到质的革命性变化,尤其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更是让这场革命带有紧迫性。

推进知识体系的智能计算,从而更好地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对党中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号召的积极响应,更是增强中国政治学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文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维度出发,探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智能计算路径。

一、以学科体系的智能计算夯实基础支撑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学必须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中抢占先机,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实现双重突破;既要推进现有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入发展,利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更要开创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计算政治学理论体系,利用新技术解决新问题。实现该目标的首要前提是构建既体现数智时代特征、又彰显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新型学科体系。

作为知识体系的骨架,学科体系主要发挥结构支撑作用。在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宏观学科框架,其首要步骤是确立相应的学术门类,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制度性保障,也是构建学术梯队和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前提。2024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新增设计算政治学二级学科,凸显了政治学对智能计算的重视,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理念。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明确学科发展的重点与边界,同时也要清楚,政治学下所有的二级学科,比如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国家治理、国际政治等其他二级学科都需要应用智能计算的方法提升科学的研究的水平,应该推动“政治学+计算科学”复合型学科网络的形成。尽管宏观学科框架能够起到规范与框定的作用,但要全面推进学科体系的发展,还需从多个方向寻找着力点。

一是积极推进教学体系的模块创新。教学体系直接关系到学科人才培养。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以相应的教学体系为支撑。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如清华大学,已经开始招收计算政治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设置相关课程。北京大学也将计算政治学列为本科培养方案中的方法类课程,并在数字治理方向融入相关内容。然而,教学体系的数字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完善计算政治学教学体系、编写相关教材、开设计算政治学选修课及促进多学科交流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同时,目前开设计算政治学课程的高校寥寥无几,这可能导致计算政治学人才队伍短缺的问题,人才的缺失又会对计算政治学的推广造成阻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现有的政治学专业也缺少与计算政治学融合的动力。这些都是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是依托学术团体的协同支持。学术资源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动力,数字化学科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大型学术组织与核心期刊的支持。至今,中国政治界已多次举办以计算政治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包括“计算政治学论坛”“数字政府40人论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论坛”及“计算社会科学国际会议”等。2025年第二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论坛”更是以“数智技术赋能哲学社会科学实验研究”为主题展开讨论。《行政论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探索》等核心期刊也将与计算政治学相关的内容列为重点选题方向。未来,学术界和期刊界应当推动构建强大的数字化学术研究共同体,加大力度支持“政治学+计算科学”跨学科研究,更加强调理论创新与方法论的协调发展,推动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是加快推进数智人才队伍建设。任何学科在初创时期,都面临人才紧缺的难题。这也是国内高校迟迟无法普及数字化政治学学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治学必须加快数智人才培养,既可以从事具有丰富理论和知识基础的本专业人才中培养,也可以吸引计算科学等相关专业具备相应方法技能的人才,从而构建起具有复合型知识基础的人才队伍。目前,政治学界正陆续召开人才培养论坛,为学者们学习、研讨计算政治学领域相关议题提供平台。各大高校也推出一系列讲习班和工作坊,为科研工作者、研究人员提供学习和交流机会,促进计算政治学的人才培养。目前这些讲习班主要专注于基础知识的讲解,普及基本方法和讲授基本理论。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促进计算政治学发展,还应当注重师资队伍的能力培养,打造一批专业化的能够从事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师资人才。

二、以学术体系的智能计算繁荣知识生产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以完备的本土化学科体系为支撑,更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生态,进而实现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生产力相对滞后以及学科起步晚等原因,中国政治学依赖于西方理论和概念的引入。虽然吸收外来无可厚非,但更为重要的是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形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才是发展的关键。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本土政治已展现出多种制度优势,同时,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中,中国又紧跟技术创新的前沿,甚至在一些领域超越了西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迎来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绝佳时机。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中国政治学界亟须打造独立的学术生态,以实现自主的知识生产。

作为知识体系的血肉,学术体系是其创新发展的关键内容。学术体系的发展首先需要建立独立、自主、合作且稳固的学术生态。数字化学术生态,既包括计算政治学实验室等基础设施,也涵盖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合作网络。自2016年以来,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数据治理实验室、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数字政府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智慧国家治理实验室等,助力数字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教学培训、创新实验与决策咨询,服务于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同时,各学科间逐渐打破专业壁垒,展开广泛合作。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尤其重视文科与理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致力于构建综合性创新平台,通过跨学科合作解决国家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北京大学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也促进了学科交叉,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天津师范大



学则整合了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优势学科资源,共同建立实验室,并致力于在学科基础上形成开放式研究平台,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目前数字化学术生态的建设在基础实验室的设置以及“文文交叉”“文理交叉”“文工交叉”等学科交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在主体间协同方面仍有扩展的空间。一方面,高校实验室的设置可以更多地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合作,通过数据共享与合作研究等方式,弥补科研机构在数据和算法方面的不足,有效解决现有的数字壁垒问题。另一方面,高校之间也应当开展跨校合作。各高校应打破孤军奋战、各自为政的局面,展开通力合作,弥补新兴学科学术力量薄弱的短板。尤其是那些拥有丰富发展经验的高校应为新设计计算政治学的院校提供基础设施、人才和经验支持,形成各大高校协同发展的工作。

数字化浪潮推动学术生态重构,催生出新型知识生产范式。目前,该范式已相对成型,并在三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一是以数据驱动为基本逻辑。数据驱动能够有效突破传统研究的样本局限,利用云平台整合多源数据,充分发挥大数据的研究价值。二是以算法模型为研究工具,通过设计各种分析算法解构复杂政治现象。清华大学曾构建出“大型社会模拟器 Agent Society”,精准模拟社会舆论传播、认知观点极化和公众政策响应等复杂情境。三是以智能计算为研究路径,通过对数据的智能化提取、处理和分析,获取政治洞察。北京大学积极开发相关的政策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结合自动与人工的方法,实现政策大数据的采集与可视化呈现,助力研究人员进行政策分析。今后,高校应更加注重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在数据、算法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尤其许多科技公司拥有先进的算法和丰富的数智人才,高校可以积极引进科技公司的人才,为数据库的本地部署和算法设计提供支持。

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型推动着中国政治学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构建。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正加快理论创新,以应对数字时代的新挑战,在学科本体论、政党建设、民主实践和治理现代化等维度形成原创的概念和理论,展现出鲜明的理论自觉性与学术自主性。计算政治学作为学科概念之一,依托大数据挖掘、社会仿真建模与实验方法,深入分析数字时代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不仅革新了政治学研究工具,也推动形成了“数据驱动—理论阐释—实践验证”的知识生产机制。数字党建则源于本土实践,强调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并已发展至智慧党建阶段,形成了“智能技术嵌入—组织流程再造—组织效能提升”的新模型。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亦呈现多维突破:“数字全

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协商民主”“数字群众路线”等概念与理论相继出现,致力于构建情绪计算、需求识别、共识凝聚和智能反馈等环节,推动民意感知、政策调适和效果评估智能化。在新兴治理理论的构建方面,平台型政府和元宇宙治理等新概念也相继产生,致力于实现数字化治理和针对数字的治理。这些理论创新或根植于本土政治实践,如“数字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特色民主理论创新的知识谱系。

三、以话语体系的智能计算强化叙事传播

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涉及知识体系内部的发展,而话语体系则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并不是要闭门造车,构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要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互鉴中不断提升理论深度,并传播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从而增强中国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智能计算技术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动力。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亟须建立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自主话语体系,以技术赋能实现价值引领的深入化和叙事传播的智能化。这不仅有利于巩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还能够使中国政治学在全球知识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为此,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依托数智技术深化理论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及中国气派的叙事体系,还需要优化话语传播的渠道与形式,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基于此,中国政治学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紧抓数智技术带来的时代机遇,立足本土实践,不断创新概念和理论,丰富政治学自主话语体系的内容。针对国内议题,中国学者积极推动话语体系的数字化转型,陆续提出“数字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协商民主”等新概念和理论。它们既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也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今后,政治学应当继续构建体现中国文化底蕴与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在话语构建中展示中国文化,在传播中彰显中国精神,形成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坐标系。针对全球议题,学术界还提出“数字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应对数字鸿沟、霸权主义等挑战,推动普惠包容的全球数字秩序建设,体现出中国独具特色的普惠共赢、文化包容、共享共建的文化基因。今后,在全球议题的对策方面,承担中国责任、贡献中国智慧、展现中国担当,亦是话语体系建设和传播的重中之重。

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叙事传播为落脚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可见,在构建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的同时,还应全面提升传播效能,增强中国话语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目前,中国政治学界对自主话语体系的传播以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为主。然而,这种叙事传播方式相对单一,且功能主要集中于学术交流,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效果相对较弱。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依托智能计算,中国政治学界可以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大有可为。无论是学科目录的调整、学术体系的繁荣,还是话语体系的传播,都为智能计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智能计算也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无限可能。

(作者分别为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国学院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深刻理解“投资于人”的人民性底色

曾祥明 贺新元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投资于人”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的深层次变革。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人民性底色注入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赓续,亦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精准回应。

一、“投资于人”实现从经济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范式跃升

“投资于人”作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创新表述,标志着我国发展观从“物的积累”向“人的发展”的深刻转型。

其一,“投资于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投资于人”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培育现代化人力资源实现增长动力变革。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33.7%增至2020年的36.8%,但相比于发达国家约75%的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这种结构性调整,恰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密钥。

其二,“投资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人的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从脱贫攻坚战中“志智双扶”的实践智慧,到乡村振兴战略中“育才引智”的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终极价值。

二、“投资于人”人民性底色的三重维度

“投资于人”的人民性特质,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沃土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这一论断在“投资于人”理念中具象化为三个理论维度。

一是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中国的“投资于人”,始终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如北京“十四五”时期在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4所优质学校,正是将人力资源开发嵌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生动实践。

二是彰显共建共享机制的制度创新。我国“投资于人”强调集体理性与个体发展的辩证统一。通过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激发个体创造活力(如深圳对青年创客的孵化投入),又筑牢社会风险防线(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覆盖49个城

市)。这种“托底”与“托举”并重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三是彰显共同富裕理想的价值引领。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人力资本投资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度融合: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创富能力,又通过乡风文明建设重塑精神家园。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向赋能,彰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人力资本开发的导向作用。

三、构建系统集成的中国式“投资于人”方案

落实“投资于人”,需要构建“政策—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生态系统。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实践,可从三个层面探索实施路径。

一是制度供给层面,强化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建议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验,建立“教育—产业—就业”闭环政策体系。《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渠道”“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等举措,需配套职业资格互认(如京津冀人才绿卡制度)、产教融合基地等实施载体。同时,完善人力资本核算体系,将教育、健康等投入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二是资源配置层面,激活要素流动的协同性。针对区

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可建立跨区域人力资本补偿机制。如雄安新区建设中推行的“京籍疏解单位员工子女教育”政策,有效破解了人才流动的后顾之忧。在数字经济领域,应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创新机制,使新职业群体共享发展红利。

三是治理创新层面,增强社会参与的有效性。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参与的终身学习体系。例如海尔集团建立的企业大学模式,持续提高员工培训投入产出比,为民营企业参与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范例。在乡村振兴领域,可推广“乡贤智库”“新农人培育”等基层创新,激活乡土人才内生动力。

“投资于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唯有坚守人民性底色,方能在“投资”与“育人”的辩证统一中,谱写出属于新时代的人间正道。

(作者分别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2024年度重点项目“基于四位一体的‘科技矿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